

文史資料

天下

史料选辑

精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第五十辑 (总第二五〇辑)

公

孙文

年 青 新

LA JEUNESSE



联合起来向前进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十輯(總第一五〇輯)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史资料选辑·第150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12

ISBN 7-5034-1293-3

I. 文… II. 全… III. 文史资料—中国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752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北京华正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华正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5 字数: 219 千字

印 数: 3500 册

版 次: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文史资料选辑》编委会

主任 朱作霖

副主任 刘恕 刘济民 李东海 吴福 宋望

金开诚 金冲及 龚育之 张文惠(常务)

委员 王庆成 王晓秋 王楚光 刘景录 李汉秋

陈威 陈砾 陈漱渝 周秉德 弥松颐

傅璇琮 舒乙 党德信 马威 胡太春

俞兴茂 霍明光

本辑执行编委 张文惠 俞兴茂

本辑执行编辑 潘志军

目 录

民主斗争

- | | |
|-----------------------|--------------|
| 民盟在民主革命中的艰苦斗争 | 周新民 (1) |
| 从民建发起到“较场口事件” | 林涤非 (8) |
| 回忆旧政协会议期间的民建会 | 范尧峰 (21) |
| “较场口血案”中的劳协 | 叶维民 范振声 (29) |
| 重庆“较场口事件”见闻及其前后 | 钟复光 (48) |
| 我参与审理“较场口血案” | 汪 廉 (57) |
| 张澜先生在重庆 | 沈自强 (73) |
| 鲜特生的“民主之家” | 吕光光 (79) |

民国政事

- | | |
|--------------------------|-----------|
| 重庆“二二八”事件纪实 | 陈文荣 (96) |
| 参加国联讨论日本侵华的几次会议的回忆 | 王家桢 (117) |

抗战纪实

- | | |
|----------------------|-----------|
| 中央军委华北联络局与山东抗战 | 张友渔 (139) |
| 回忆抗日战争二三事 | 张素我 (145) |

- 七七事变回忆 徐逸樵 (150)
流亡万里到渝州 伏笑雨 (153)
记举世闻名的一条空中运输线 赵 新 (170)
中国远征军缅甸战役纪实 周郁谋 (179)

军事史苑

- 国民党军窜犯东山岛遭到惨败的经过 陈士彦 (222)
中央军事慰劳团简介 刘子英 (230)

人物述林

- 纪念二伯父孔祥柯 孔令仁 (243)
记珠海唐家为清华服务 唐绍明 (247)
男女平等的先驱——黄炎培 曹淑瑞 (257)
杜聿明与东北中正大学 焦实斋 (260)
于右任为什么从重庆出走成都 高一涵 (264)

民主斗争

民盟在民主革命中的艰苦斗争

周 新 民*

旧政协会议举行前，民盟在重庆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除制定盟章、政治纲领和增选中央委员以外，还提出呼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召开普选的国民大会三大问题。

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不久，国民党即破坏《双十协定》，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调动所有军队到交通要道，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内战。民盟主席张澜于1945年12月30日分函国、共两党，希“于1946年元旦，双方发令所属一切军队即日停止武力冲突，所有问题均得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1946年1月10日^①，民盟中央发言人对时局发表重要谈话，首先提出停战问题：“（一）赞成停止军事冲突，同时恢复交通，但一切军队，应各驻原地，不能利用铁道调动军队。（二）军事考察团除由国共两党代表参加外，我们赞成由政治协商会议公推社会公正人士组织之。其人选不限于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三）我们曾建议国共两方于元旦宣布停战，现既未能做到，政府所公布之办法，我们主张能照以上所修正之点于协商会议开会以前做到，以慰国人之望。”

* 作者当时系民盟中央委员。

①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记载的时间为1946年1月2日。

蒋介石在各方压力之下，不得不于旧政协开幕之前两小时签发了停战令。

旧政协会议于 1946 年 1 月 10 日开幕，青年党公开投靠了国民党，与民盟处于对立地位。民盟组成以张澜主席为首的代表团，自参加旧政协会议之日起，始终与中共代表团站在一起，互相配合，这是民盟同中共的第一次公开合作。

旧政协会议开幕时，由沈钧儒代表张澜主席致词，首先说明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求国内的和平和政治的民主，一定要先有和平而后才能实现民主。其次，谈到八年的抗战，人民大多颠沛流离，无食、无衣、无住，急需解决当前复员与救济这些问题。第三、要解决实行开放政权，订定共同纲领，召开国民大会，以及制定宪法，实行宪政等等问题，首先不能违反人民普遍的愿望，要在会议中求得公平合理的结果。最后他谈到，先烈们用鲜血生命换来的抗战胜利，我们只有努力奠定国家永久和平，建立国家真实民主的基础，才对得起死难的先烈和全国人民。

民盟在旧政协会议中提议很多，详载“政协文献”，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实践诺言，迅速保障人民自由权利。（二）制定和平建国纲领。（三）重选国民大会代表。

在会议举行的最后一次综合小组上，民盟代表团还提议：（一）解决东北善后问题。（二）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政治犯”。（三）制定侵害人民自由治罪法。（四）延长政治协商会议到宪法实施。

旧政协会议的重大成就，就是通过政府改组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宪法草案和军事问题案。这五项决议案的通过，是有利于和平团结民主统一，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及其内战政策，否定了国民党的法统，这就是中国人民的政治胜利，国民党的政治失败。

旧政协会议闭幕不久，国民党即于 1946 年二三月秘密召开二中全会，首先否认了旧政协决议，并批评国民党出席旧政协会

的代表邵力子等，随即在全国发动了大规模内战。国民党当局为了巩固后方，还发动了一系列的打击民盟的活动，使民盟在半年中遭受到很大的打击。其中主要有以下事件：

一、重庆“较场口血案”

旧政协会议期间，重庆市民组成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经常在沧白堂开会，邀请民盟和社会贤达出席旧政协会的代表报告会议经过，国民党特务经常去捣乱，造成“沧白堂事件”。1946年2月10日，又制造了较场口血案，当日重庆市民在较场口开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预先派遣大批特务分布会场。民盟中委李公朴刚上主席台宣布开会，特务即破坏会场，将李公朴从主席台上拖下来，并以铁锥子刺伤其头部，郭沫若、施复亮等亦均受伤。

二、反苏游行

1946年2月22日，国民党为制造反苏、反共、反民主的气氛，污蔑苏联在东北“侵犯中国主权”，在重庆发动大规模的反苏示威游行，号称二十万人，将中共的《新华日报》社、“新华书店”和民盟的《民主报》社全部捣毁，并殴伤工作人员多人。当时“新华书店”所有书籍悉被撕成碎片，沿街约有五里路长到处都铺满了纸屑。同时，国民党在成都亦纠集一部分三青团人员发动了反苏游行，捣毁了“新华书店”成都分店，并在四川大学制造了“诬害三教授事件”，即诬害李相符、彭迪先、陶大镛三教授。

三、西安“李敷仁、王任惨案”

民盟中委李敷仁是西安社会教育家，工农群众都尊他为老师。国民党特务以其思想进步，1946年4月30日秘密加以逮捕，用黑布将他的双目蒙罩，押到郊外枪杀。李敷仁身中三枪未死，滚入泥沟里，幸而农民听到枪声奔来抢救，发现是李老师被杀，大吃一惊，立即将他抬至农村，藏在农民家里，后来掩护送到延安医愈。民盟中常委杜斌丞发行的《秦风工商日报》，于1946年

3月1日被国民党特务捣毁，西安名律师王任自告奋勇出任该报法律顾问，严正斥责特务暴行，于4月1日被枪杀。同年5月3日，该报在特务纵火、投慢性燃烧弹之下，被迫停刊。5月29日民盟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抗议，要求追究责任，惩办祸首。

四、南京“下关血案”

1946年6月23日，上海十万市民举行大会，欢送民进主席马叙伦率领上海人民和平请愿代表团赴南京请愿。请愿代表团刚抵南京下关车站，即被国民党特务围攻达五小时之久，代表们多受重伤。叶笃义前往迎接亦被殴打。女记者浦熙修等往采新闻，不只被打，全身衣服还被其撕毁。

五、昆明“李、闻惨案”

民盟中委李公朴、闻一多因在昆明领导民主运动，早为国民党所仇视。蒋介石为配合前线军事行动，密令国统区各大城市的特务机构严密镇压民主运动。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接到密令后，曾两次电报请示，蒋下令“得权宜行事”。霍揆彰即大胆放手，布置一切，于1946年7月11日晚10时指派特务，以美制无声手枪在学士坡暗杀了李公朴。同月15日下午5时，又在西仓坡枪杀闻一多。

“李闻惨案”发生，在国内外引起普遍愤慨，民盟中央除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外，并派梁漱溟和我赴昆明调查其真相。国民党当局以一切安排尚未就绪，多方阻扰和拖延，使我们不能早日前往。同时，昆明民盟同志以当时环境险恶，对我十分爱护，曾来电劝阻。我以组织已经决定，李、闻两烈士又和我久共患难，不能畏难不去。我们于8月3日起程，国民党当局派秘书张寿贤陪同我们，从南京途经重庆，6月始抵昆明。我们刚下飞机，住在“商务”酒店，即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行动失去自由。我们在昆明住了16日，只有王健（李公朴的女婿）、高学達（《大公报》记者）、曾雨峰（滇新银行职员）等来看过我们，其余老友多不敢来。每次客来，特务在旁边作记录，甚至吃饭和

睡觉时也有特务从旁窃听我们说些什么。我们到昆明的第二天，《中央日报》发表文章，认为梁漱溟为人公正，大捧一场；周新民成见太深，大骂一顿，其目的就是警告我。当时他们指责我的事实，就是我经过重庆时，正值重庆各界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会，我去参加公祭，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和到会大众都要我说几句话，我在说话中指出在陶先生死前，上海有一个 18 人的黑名单，第一名就是陶先生。他知道迟早要出问题，所以加紧努力工作，白天为育才学校筹款奔走，夜间为整理自己著作不睡，以致忧劳过度，突患脑出血而逝世。他表面上死于病，实际上是死于国民党特务之手。我说这些话明明是有根据的，《中央日报》却指责我成见太深。

我们到昆明后，国民党当局对我们采取冷淡和孤立的策略。延至 8 月 9 日，顾祝同始同我们见面，劈头就问我：“你是否在大别山搞过？”我答以曾参加过大别山的抗日工作。顾祝同为什么要旧事重提呢？因为我从 1938 年春在大别山主持安徽省总动员会组织，在中共的领导下组成了 52 个县动委会、72 个工作团（直属的 42 个、县属的 30 个），共有青年干部二三千人，国民党想尽方法夺取这个力量，终未达到目的，乃集中目标打击我，我于 1939 年 6 月被迫离开大别山。后来这批青年干部都去了新四军，国民党认为这是我“为共产党培养干部的罪行”，在重庆、巴东、老河口等处均控告我。因此，我和顾祝同初见时，他即提出这个问题，显系有意吓唬我。

我们到昆明后，首先代表民盟慰问李、闻两家烈属，并拜访楚图南、冯素陶、尚钺、潘大逵等，他们定于次日离昆，留冯素陶帮助我们。可是我们每次出去，均无交通工具，又有七八个特务跟着，弄得我们无法活动。后来我向梁漱溟建议说：“这个政府对你好些，请你专门应付它，我来设法进行调查。”梁漱溟说：“特务时时跟着你，你有什么方法去进行调查呢？”我说：“我在昆明工作过三年，路线和人事都熟悉，特务虽然跟着我，我还可

找机会去活动。”后来即照这样分工。我第一次单独去云大医院慰问闻夫人和她的儿子闻立鹤，有四个特务跟着我，但他们未进医院大门。我慰问闻夫人母子后，立即从医院后门走到云南大学，约集进步学生开会密谈，将搜集材料的线索和步骤安排好，并鼓励他们早日完成任务。会后我回到商务酒店，那四个特务还未回来，可能在医院大门外等着我。从此，我每天出去，常设法把特务丢在后面。

我们正在调查中，顾祝同和卢汉于 8 月 13 日约我们吃晚饭，饭后顾祝同请梁漱溟至别室小谈，说李案凶犯未获，闻案 15 日可“公审”，请参加观审。他们所谓的“公审”，事实上就是假审判，所谓观审就是旁听。霍揆彰收买李文山、汤时亮为假凶犯，演习多日，始进行假“公审”我们曾复函不同意这样办，但为彻底了解其丑恶，又不能不借观审去察看。在“公审”的时候，既无人证又无物证，只是法官和假凶犯一问一答，完全是在演滑稽的丑剧。我们观审完毕，立即去函提出种种疑问，认为完全是假审判。当时我们还怀疑他们将要演习假执行，果然，在我们离开昆明不久，宪兵第十三团于 8 月 26 日在昆明东站外三公里公路旁贴了布告，说要枪决闻案凶犯，但沿途戒备严密，在两小时内不许行人通过，使人无法看见被枪决者是谁。当时有人参与其内幕，亲往刑场观看两具替死鬼的尸首倒卧在地上，并非是“公审”堂上的李文山、汤时亮。这也和处决“一二·一”惨案的凶犯一样，证明了在国民党统治下真是“无事不弊”了。

经过十天的调查，材料多已到手，我整出两份，由梁漱溟和我各带一份。这时候忽接到一封密信说：“你搜集的材料多靠不住，我在云南警备司令部工作，掌握了李、闻案的全部材料，你如能介绍我携眷赴延安或者给我 3000 万元，请你到某处面谈，我可将全部材料给你。”当时我同梁漱溟商议，认为其中一定有阴谋，故置之不理。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幸得云南大学进步学生大力帮助，才能搜集得各种证据，发表了《李、闻案调查报告

书》，向全中国、全世界正义人士控诉国民党的罪行。

六、成都血案

张澜主席和成都各界得知李、闻被国民党杀害，极为愤怒，订于8月18日在成都“蓉光”电影院举行李、闻两烈士追悼会。国民党特务即在会前散布谣言，多方破坏。到了散会时，忽有人高呼“打倒民主同盟”，“打倒共产党尾巴”，“打倒张澜”等口号。张澜主席刚走出会场，又有人向他投掷包裹着玻璃碎渣的小包和装有红色药水的玻璃瓶，击伤他的头部三处，血流如注，面部胡须及上半身均是血迹。大会职员张松涛亦被殴伤甚重。民盟四川省支部于1946年8月20日曾为此案向川康当局提出备忘录，实际上就是抗议。

(1964年)

从民建发起到“较场口事件”

林 涂 非*

重庆民主运动的兴起

抗日战争胜利后，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致电蒋介石提出制止内战的六项主张，博得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作出一种和平姿态，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谈判。在这种形势下，重庆的和平民主的气氛更为活跃。

我记得首先是由冯玉祥和李济深两位将军，发起一个上书蒋介石要求“党内民主”的签名运动，提出十大具体要求，其中最使蒋介石感到头痛的两点是：（一）立即释放全国政治犯。（二）立即解散一切特务组织。但国民党一直都在“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控制之下，一般国民党员只有缴纳党费的义务（规定由会计于发薪时扣除），而无发言的权利，加之CC特务横行，谁也不敢签名而惹祸遭灾。只有极其少数国民党左派人物，才不畏风险响应签名运动，如陈铭枢、谭平山等人是热烈响应，签名于头十名之内的，其他的人我就记不清楚了。我和王葆真是同时签名的，大约在二三十名之后，一共究竟有多少人签名亦无从知道。

听说这封签名信由冯玉祥亲自交给了蒋介石，自然触怒了蒋介石，后来他就派冯出国考察水利，并派一艘军舰、一排士兵，名为护送赴沪，实即押送出境。行前我们在重庆陕西街贵州省民

* 作者曾任重庆“和丰”银行协理兼秘书长，系民建总会首届理事。

行聚会，由王葆真出面设宴为冯玉祥饯行，并由王葆真去邀谭平山，我去邀陈铭枢两位作陪。但冯因故未来，谭、陈两位亦因事未来。王葆真介绍我与黎季云、黎又霖兄弟及李国珍（亦签名人之一）认识。

在此以前，王葆真曾告诉我说，蒋介石把李济深请到重庆来，是想利用他统率桂系军队打共产党，给他“剿匪”总司令的名义，李却不肯干。席间李济深说他送冯玉祥到上海后，自己就去香港，准备将来发起成立一个国民党内的革命组织，要我们在后方响应，不要因为这次签名运动受了一点挫折就消沉起来。

毛主席亲来重庆和谈，将重庆的民主运动推向一个高潮，一时间组织政党和政治团体的声浪，不绝于耳。一些有社会地位的人，都想组织一个新党，如章士钊想组织一个政党，曾邀我参加过两次非正式的筹组会议（他曾做过我筹办二岩煤矿公司的法律顾问），但两次到会的都不满十人。章士钊没宣布组党派的目的和名称，只说经济上有办法，要大家不必顾虑，也不要害怕风险，大胆放手发展组织。我从旁一打听，原来他是“奉命组党”，并已定名为“农民党”。我想这种党派与我们组织的党派目的不同，以后我就没有再去，下文如何也不得而知。这也算是我亲身经历重庆民主运动的一支小插曲，故尔一谈。

民建会发起组织过程中的一鳞半爪

在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发起组织之前，我也和其他从事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一样，想为民主运动增加一点力量，曾和范尧峰等人组织了一个政治小团体叫做“九九联谊社”，这是因为9月9日是中国在南京正式举行接受日军投降仪式的大喜之日，所以我们就将社名叫做“九九”。

当时我是重庆“和丰”银行协理兼秘书长，我的办公室便作为暂时集会之所。我们每隔三天集会一次，主要是交换时局动态

和讨论发展组织的计划。我曾想过一个天真的发展组织的办法，叫做“九九连环组织法”。办法是以九人为一小组，每人各负发展九人之责，发起人担任小组联络召集人，这样一环套一环地发展起来，比较容易收到快速壮大之效。但大家认为这样过于呆板，不如自由发展的好。记得我们集会时间很短，次数不多，发展人数也不多，大约不到二三十人，大都是中层知识分子和工商界、银行界的从业人员。

就在这时，范尧峰陪同孙起孟邀我参加民建组织，当我听说民建会是以黄炎培为发起组织时，就毫不犹豫地同意参加。因我知道黄炎培社会声望很高，他为了和平民主运动，不辞辛劳不畏风险，往来于重庆、延安之间，深孚众望。由他出面组织一个从事民主运动的政党，是有很大号召力的，也是很有前途的，加之我和黄炎培有过旧谊。

我和范尧峰初步决定参加民建会，我又去“华康”银行找李国珍商量，恰遇施复亮正和该行协理鄢公复谈话。施复亮见了我很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想邀你和公复参加‘民建’，公复已同意，你怎么样？”我笑着回话：“那当然没有问题，您都迟了一步呢，昨天孙起孟已来邀我参加了，我不仅个人参加，还准备把我这个小团体的人一起介绍参加，我们的小团体成不了大事，还是跟着你们来吧！”

由于施复亮的相邀，加快了我参加民建会的决心与步伐。两三天后“九九联谊社”座谈时，我就征求大家意见，是集体参加呢，还是自由参加呢？大家认为原则上采取自由参加方式，表示希望大家都参加。当场表示参加的有王之浩、胡景文、李国珍、仲九华、高询侯等人，随后继续参加有“巴蜀”中学总务主任沈景岳等人，其他的人就不能一一记清楚了。大约有半数以上的人参加了民建会，“九九联谊社”也就宣告解散，把力量转移到民建会来了。我原想把所有的“九九”成员统统介绍加入民建会，但一些人有顾虑，特别是银行界的朋友，更是畏首畏尾，甚至已

经参加民建会并当选为理监事的人，开会都很少出席，不过那毕竟是极少数。当然银行界也有比较热心表现积极者，如黄墨涵、鄢公复等人。

民建会是以“职教社”的基础，加上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小工厂联合会这三部分的力量，再加上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人的社会声望的号召力，这就很容易联络和吸引工商界的从业人员和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经过大约三四个月的筹备，1945年12月，终于在重庆望龙门西南实业大厦召开了“民建”成立大会，出席人数大约不到100人（记得选举理监事得票最多的是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人，但均未超过一百票）。大会公推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三人为主席团，首由胡厥文报告民建会成立意义，继由黄炎培报告筹备经过，提出民建会的政治态度是：“不左倾，不右袒。”^① 得到大会一致的拥护。并着重表明民建会的成员都有正当的社会岗位，没有以政治为职业者，不做任何党派的尾巴，亦决不排斥任何党派；提倡民主，不采用固定的领袖制度等等；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中间路线的政党。

这是非常符合当时一般从事民主运动人们的思想状况的，我也一样。我们这些人，既不满蒋独裁政权的贪污腐化和无能的政府，又害怕共产党的暴动政策和过激的阶级斗争，认为国民党过右，共产党过左，最好是不左不右走向一条中间路线的平坦的革命道路。针对这种“想革命又怕革命”的思想，郭沫若在香港发表一篇驳斥人家攻击他是共产党的尾巴的文章，大意是说能够做共产党的尾巴的人，就是跟上了时代，较之那些远远落后于时代后面的人们先进得多！这篇文章是通过抄录传阅方式在一个秘密场合见到的，使我受到一次启蒙教育，思想上开始转变。直到国共和谈破裂，所谓中间派向两极分化时，一向中间偏右的民社党

^① 《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中提的是“不右倾，不左袒”。